

林涛海韵丛话

文学典型论

李衍柱 著



人民出版社

林涛海韵丛话

文学典型论

李衍柱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惠 pphLh@126.com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责任校对:马 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典型论/李衍柱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林涛海韵丛话)

ISBN 978-7-01-011927-4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理论研究

IV. ①A811.691 ②I0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4040 号

文学典型论

WENXUE DIANXING LUN

李衍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25 插页:2

字数:464 千字

ISBN 978-7-01-011927-4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在书房里。



2006 年，同夫人林春英在美国康州大西洋海岸。



1964年7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届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全体同学与班主任何其芳先生合影，前排右三：何其芳，右四：何洛，右五：马奇。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班毕业留影。前排左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先生。



1979年12月5日，在南京参加华东地区“现实主义研讨会”，作《观察个性、研究个性、刻画个性——文学典型问题断想》的发言。会议期间，周扬应邀到会，并同会议代表留影。前排右二：周扬，右三：高觉敷，中排右三：徐中玉。



1998年12月，在深圳与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合影。



2001年4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文学发展趋势与文学评论教学改革研讨会”，与钟敬文先生合影。



2011年10月23日，与莫言在北京相聚。

总序

学术人生自述

在艺林中穿行,在书海中漫游,总会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想,有所悟。既有惊和喜,也有苦和乐。

当晨曦濒临大地,一束束金色的阳光射进郁郁葱葱的山林,迎着和煦的晨风,起伏翻滚的松涛奏出的那种山水清音,令人神往和陶醉。

炎夏时节,仰游在蔚蓝的大海波峰,一串串水珠、一排排浪花不时地亲吻着面颊,你的心头又怎能不感到自由、幸福和舒畅。

“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的这段名言,是我追求的一个理想人生境界。

仁者,爱人。爱是追求真、善、美的最好向导。只要你对人类的家园和对你所追求的事业充满了爱,就会从中获得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山,雄伟壮丽,陡峭险峻,蜿蜒起伏。你是万木竞生、百宝潜藏的福地,又是千鸟欢唱、争鸣的家园。顶天立地,厚德载物,崇高与优美、坚韧与宽容是你的容貌和象征。

知者,爱智。你像大海一样,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容纳百川汇聚。汪洋恣肆的大海,你是水的王国,你是生命的象征,是映现万物、照射四方的明镜。你那磅礴、舒缓、潮起潮落的节奏与美妙动听的和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求知者自强不息,去探寻、撬开未知世界的大门。

童年记忆

我的生命旅途和学术生涯,与山林有缘,与大海相通。山、海、林如影随形,始终与我同步前行。

1933年,我出生于一个群山环抱的青岛市崂山县小农村。父亲在村里

任小学教师,母亲务农。生我那年,我爷爷已74岁,可是在这个主要靠务农为生的有32口人的大家庭中,第三代中全是小嫚(我家乡称女儿为“嫚”)。因此,我这个长子长孙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喜庆。当时家境虽然清贫,但对我的抚养特别尽心和周到。在我满岁时,父母抱着我走了三十多里路到青岛市里最好的照相馆,让我带上一个铸有“长命百岁”的银锁拍照留念。这张照片是父母给我留下的儿时最珍贵的礼物。

童年的记忆是最难以忘怀的。有三件事我感到最惬意、最愉快。

第一件事是每年春节前跟着父亲为乡邻、亲朋写对联。父亲是我生命历程中第一个启蒙老师。从我记事起他就教我识字、写字,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父亲上过当时崂山的最高学府“李村公学堂”。父亲一向助人为乐。凡有红白喜事、遇到需要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乡亲们都愿意找他。每年进入阴历“腊八”(腊月初八)到“过小年”(腊月二十三)前后,乡亲们总会陆续来找他写春联。他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父亲写春联时都要把我拉到他身旁,让我给磨墨、按纸、晾对联。记得父亲给乡亲们写得最多的一副对联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我们家的大门上每年贴的也是这幅对联。因此,这十个字我记得最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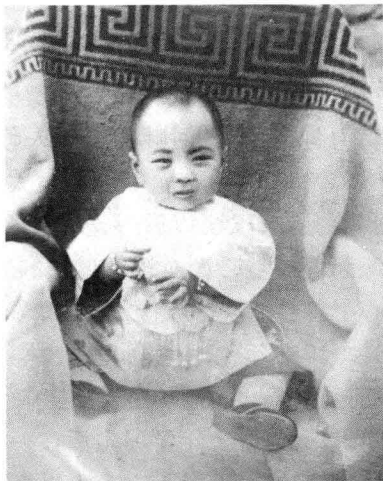
◎ 母亲王淑贤,1921年11月23日生,1994年10月6日去世



◎ 父亲李修清,1890年2月17日生,1972年11月12日去世

第二件事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的事情。我外祖母家住在华楼山与石门山下的“西山旺”。房屋周围几十亩高低不平的土地全是樱桃树。南北山坡上的梯田中布满了苹果、山楂、柿子、花椒树,地堰种上的是芝麻、豆角。每年到了樱桃熟了的“小满”时节,我都要跑到外祖母家住些时日。有一次,记得表哥将我抱到一棵最大的樱桃树的树枝交错可坐可依的树干上坐下,接着就不断给我摘来一些又紫又圆不同种类大

小不一的好吃的樱桃。我坐在摇椅似的树干上,看着周围一片片摇曳多姿、绿叶烘托出的朵朵红果,听着黄莺、麻雀、喜鹊、布谷鸟与众蝉的合唱,闻着附近两棵大木瓜树散发出来的扑鼻清香……这时,也就是在这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美的滋味。



◎ 作者周岁留影

第三件事是一个秋天与表哥一起到华楼庙拾“白果”(银杏)。从外祖母家到那里要爬四五里路的山。在华楼庙下面的山坡,有很大一片石竹林。伴随着阵阵秋风的吹拂,由下而上、绿叶浓密满山的石竹林,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片波浪翻滚的绿色海洋。我与表哥拨竹攀藤蛙游似地行进在这绿色的海洋之上,耳边不时响起竹叶发出的阵阵“沙沙”作响的声浪,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我俩才走出这石竹林的海。每每回想起这段时光的感受,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我的童年是在战乱年代度过的。爷爷去世后,父亲弟兄六个也分了家。我们一家六口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的东厢房,父母和姐妹兄弟六人同睡在一个大土炕上。那时家境十分困难,母亲整天带着姐姐、我和弟弟上山拾草、挖野菜。大概是1946—1947年,有一段时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记得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仅能买到一个15斤重的花生饼。全家人二十多天就是靠这个花生饼掺和着野菜度日。在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还是千方百计要供儿子上学。13岁那年,我考上了青岛师范学校初中部。学校在李村镇,离家有25里路。青岛1949年6月2日解放后,青岛师范初中部转到青岛三中。1950年7月初中毕业,我又以优异成绩考取青岛师范后师部(因那时上师范不花钱,报考的人特别多,那年是20个人中取一个)。

从小住在山窝窝里、喝着崂山的甘泉水、吃着地瓜长大的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看看大海、走向大海,走向更大的世界。父母也一再告诫我:要好好读书,出去闯闯,为咱家争光!青岛三中建在胶州湾边沧口的山坡上。我爱大海,当时每到课余时间,我总要约几个要好的同学跑到海边去拾贝壳,挖“琵琶虾”;有时还会独自面对涨潮时层层飞舞的浪花,遥看绚丽多彩的世界,默默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青春岁月

1950年7月,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了青岛师范学校的大门。在这个崂山脚下、李村河畔的培养人师的摇篮中,我度过了6年美好的青春岁月。6年,在人生的旅途中虽不算太长,然而,在青师的这6年,对我来说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每每想起或谈起这6年时光,想起或谈起曾经呕心沥血培育过我的老师和曾在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学友,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愉快的、自豪的、幸福的暖流。

1952年秋,青岛师范学校毕业,我留校做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同时还兼任“前师”(又称简师,相当于初中)的“社会发展史”课的教师。在青师工作期间,整天与青少年学习生活在一起,感到特别愉快。青少年时期,既是一个人长身体的时期,又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当时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在哪里?自己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这些问题是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同学经常思索的问题。学校通过一系列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师生之间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以“个人主义为耻、以集体主义为荣”的舆论氛围。当时大家学习、崇敬的英雄人物是保尔·柯察金和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中的主人公。每个人的日记本上几乎都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关于人生价值的这样一段话: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庸庸碌碌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
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人民教育事业,成了每个同学检查、总结自己的学习目的和人生观的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我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对人生的价值问题也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翻阅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自己也曾以《青春的火焰》为题写了如下诗句:

^①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仰熙、风芝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是建设中的一块砖；

……

水珠生存为大海，
砖瓦就为建设生。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一段时间内，有人曾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提出诘难，但是我至今不悔，仍认为这是人生的真谛所在。

青年一旦挣脱了利己主义的枷锁，自然就会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周围同学的关系，从不同方面表现出高尚的道德风貌。师范毕业生每年都有一个毕业分配问题。根据祖国需要，服从分配，是衡量一个青年思想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最使我感动的是1955年七级和三级（前师）同学毕业分配时的情景：学校在礼堂开毕业生大会，我是会议主持人，学校领导刚刚讲完市教育局下达的分配计划，全礼堂四百多毕业生忽拉拉地站立起来，连续齐声高喊：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站出来任祖国挑选！

我这个人是不轻易掉泪的，可是面对这几百个血气方刚、蓬勃向上的青年，听到这发自肺腑忠于祖国的心声，也情不自禁地落泪。在场的许多老师也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为自己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1956年7月，我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大学4年，是在一种曾给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极“左”思潮大泛滥的环境中度过的。一入校就遇上了“反右派”，接着是人民公社



◎ 1960年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

化运动和“大跃进”。自己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在这以后的年月,每每想起那些因反右而丧失了政治生命的同窗学友,总是深感痛心和悔恨。本来上大学是想来好好读点书,结果是大部分时间被强令停课搞运动。大学生活中有两件事对我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还是有意义的。

一是有计划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我深知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上大学最重要的事情是多读书,读好书。可是当时的环境又使你无法读书,白天几乎都是政治学习、搞运动。对此我很苦恼。我采取的办法是:千方百计“挤”时间有计划的读书。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不管怎么忙,每天至少必须读100页小说。这样,一个星期可以读完一部七八百页的长篇小说,一学期下来就可读二十多部长篇。那时年轻,精力充沛,白天挤时间,晚上“开夜车”。记得大学那几年,深夜一点钟以前很少睡觉,每晚要找一个没有人或人少的教室、阅览室的角落埋头读我的书。就这样,我实现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四年大学毕业时,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基本上都读了。这对我以后研究文学典型、理想、范畴等文艺学、美学问题,做了一定的文学史的铺垫和准备。

二是关于如何学习做调查研究的问题。1958年秋,我刚进入大学三年级,就被安排下放到山东最贫困的济宁地区办农业中学。当时正值推行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高潮时期。我被分配在山东师范学院济宁专区实习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为了认清形势、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办公室领导决定派我到济宁专区成武县去做一次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社会调查,最终要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为了完成这次社会调查的任务,我认真学习了有关调查研究的论文和个案调查的范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详细制定出调查提纲,经办公室集体讨论同意后,我个人便徒步从菏泽到成武县火箭人民公社做社会调查。去后,我与公社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了多次不同年龄群众的调查会,查阅了公社新建立的关于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生产分配、生活福利与文化教育的基本情况、计划总结等书面材料,并选择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生产大队作了更具体深入的情况调查,前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后经综合分析写出《山东济宁专区成武火箭人民公社调查报告》(值得庆幸的是这份用蜡纸刻板油印的调查报告,因夹在我的旧杂志中而被保存下来)。通过这次学习社会调查,在思想上形成了两点认识:

第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学习、工作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全面系统地、周密细致地调查研究,这不仅是做好工作,也是做学问、搞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任何事情,只有当你亲自做过调查研究、获取到第一手

实证材料和文献依据时,你才会有真正的发言权。

第二,内心中对“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产生了怀疑。当时报纸上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印有红字的粮食亩产几千、甚至上万斤的喜报。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地调查,让我对此发生怀疑。我调查的那个成武火箭人民公社1958年的实际产量是:

小麦:播种7622.6亩,亩产134斤,总产937411斤;
高粱:除水淹外,2050亩,亩产62斤,总计127845斤;
谷子:532.6亩,亩产121斤,总计64395斤;
玉米:4447亩,亩产72斤,总产32023斤;
大豆:1523亩,亩产68斤,总产60606斤;
地瓜:743.1亩,亩产1200斤,总产89万1720斤;
.....

这样低的产量,与报纸上的宣传相差有几十倍、上百倍之多。这怎么能得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好”的结论呢!

通过这次社会调查,使我深感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实话,说真话,这是我们做人、办事、研究学问的一条最根本的底线。现实生活中的假话、坏话可以害死人,说大话的“浮夸风”同样也能害死人。

走进学术殿堂

1960年7月我大学毕业留校,后被分配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从此我真正成了文艺学、美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1961年7月又经过推荐考试,我被正式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简称“文研班”)的研究生,1964年7月毕业。这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正是这三年,使我这个来自“山窝窝”的穷孩子,从崂山—泉城—北京,从地方走向了全国,看到了世界,引导我进入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

1961年我们入校时,正值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吃的用的是定量供给。住在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1号(又称“铁一号”),这里曾是段祺瑞执政府的所在地。著名教育家吴玉章先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亲任我们“文研班”的班主任。

学校也没有什么政治运动,同学们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大家的精神很饱满。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团结友爱,成为我们的班风。

“文研班”开设的课程有俄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法语等)、哲学、历史、中外文学史、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西方美学和文论,美学专题,文学创作等。文史哲和外语在一年级上,中外专业理论课集中在二年级上。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先后给我们授课和指导毕业论文的教师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教授,如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冯至、吴组缃、季镇淮、唐弢、刘绶松、周振甫、张光年、冯牧、侯金镜、李泽厚、叶秀山、冯其庸、何思敬、马奇、赵澧、戈宝权、叶水夫等。著名作家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李季、梁斌等也专门给我们讲过文学创作问题。著名哲学家肖前、庄福龄给我们讲哲学。这些大家的讲课,把我引进了知识的海洋,走到了学术的前沿。他们的学术风范、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他们卓尔不群的创作个性和学术见解,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打开了我长期被封闭的思想闸门,使我逐渐领悟应当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探索和研究之路。

在“文研班”学习期间,如饥似渴的我,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几乎整天都泡在浩瀚的书海之中,品尝着各种书籍散发出来的不同韵味,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去“披沙拣金”,去从成堆成堆的贝壳中寻找滚圆发光的珍珠。三年间我从文艺学范畴问题切入,系统阅读了中外历史、中外哲学史、美学史、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中的主要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著作。

“文研班”最后一年是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指导教师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先生。一听由蔡先生指导,我思想上还有点紧张。因为蔡仪先生给我们讲过典型问题和悲剧问题,他的态度显得很严肃。林宝全(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和周忠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是由蔡仪先生指导。我们曾多次去蔡先生家请教问题,有时在课后也向蔡先生请教。接触多了,对蔡先生的为人和治学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实际上蔡先生很平易近人,在学术上又非常严肃认真,对我们在撰写论文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能耐心地一一作出回答。在学术观点上,他不随波逐流,有着自己独立的学术个性。跟着蔡先生做毕业论文,受益匪浅,我学到了很多東西。主要有三点:

第一,关于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严谨、求实、创新,是蔡先生治学一贯坚持的原则,同时也是他多次告诫我们应注意的问题。他要求我们尽量找

原始文献,一般不要转引,论据一定要可靠,要站得住;再一点就是不要抄袭别人的东西,引用别人的观点可以,但一定要注明出处。一篇论文,总要提出点自己的新看法,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

第二,研究应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他赞成我抓住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典型问题,深入研究下去。他要我首先应弄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联系他们论述的作家作品,阐明他们提出的理论问题;同时他又要我注意研究当代理论界关于典型问题研究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说明问题。他一再告诫我们,凡事一定要独立思考,科学研究应当有怀疑精神,不要盲目地去跟什么风,崇拜什么人。

第三,在方法上,对典型问题,既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又要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应将历史的与逻辑的研究统一起来,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他对我的论文结构,也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要我注意论文结构的严密性和有机统一性。他对我论文中涉及的作品人物,也非常认真地提出他的一些看法,强调理论观点一定要和作品的实际结合,要以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加以印证、检验和说明。在蔡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我一直抓住典型问题不放,我在为自己掘一口井,直到把它打出水来。我自己体会,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一点,触类旁通,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不失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蹉跎年代的反思

一个人,当他还在欣欣然跟着某种潮流漂浮移动时,是无法认清方向、走上探索真理之路的。只有当他吃了苦头、碰得头破血流时,才有可能猛回头,冲出黑洞,走向光明。“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判审查,时间达两年半之久,但事实的确按照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的规律发展。它不仅使我赢得了时间,读了不少书,认清了真与假、美与丑的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从此更加坚定了自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走治学之路的决心。

康德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告诫人们,要追求真理,就要打破种种精神枷锁,既要从经验论的束缚中走出来,又要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去观察,去思考,去鉴别,去判断,迈开自己的双脚,去践行。他说:

人心中最大的革命在于：“从人自己所造成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在这个时候，他才脱离了至今为止还由别人代他思考、而他只能模仿或让人在前搀扶的状态，而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迈步，即使还不太稳。^①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心中发生的最大的革命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

站在世界思想史、文明史的高度，我们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且对中外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大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等，都应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审视和评价。他们都是人，不是神。不管是哪一位历史巨人，一旦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他们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学说，就成了我们审视和研究对象，而不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和固定不变而又必须遵守的教义。我们崇拜的是真理，不崇拜任何偶像。我们不是跪在历史巨人的面前求生存，也不是躺在他们留下来的经典文本上面讨生活，而是与他们平等地进行对话，全方位地加以审视和研究。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是他们的理论、学说中那些被人类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具有真理性的内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在新的实践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进理论的创新，谱写世界文明史上的新华章。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一个过程。学术研究同样是一个自由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一个人一旦冲断历史和现实形成的种种精神锁链，破除了头脑中的种种迷信，他的思想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他在学术上就有可能将自己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以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发出点属于自己的新声。大海的涛声，在每个人的心头激起的浪花是不同的。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和中外文艺实践的发展，必然在每一个关注文艺学、美学发展态势和走向的研究者心目中留下时代的投影。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林涛海韵丛话”书系，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我学术生涯中的心路历程和摘取的果实。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碑上铭刻的一句箴言。这句富有哲理的箴言，世人无不奉之为座右铭。我经常同我的孩子和学生们讲，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青年、壮年时代，是在翻烧饼似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

① [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等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